



小说家罗伟章： 人一生要找到自己的“酵母书”

2019年秋天开始，封面新闻推出全新人文栏目“书房”。本期“书房”，我们走进小说家罗伟章的书房。当外部环境不容易时，我们更需要沉潜到丰盈的文化精神深处汲取营养，从而在日常现实做出更友善更有力的行动。

罗伟章住在成都一个年份比较久一点的小区，需要爬7层楼梯至顶楼，才能到达他的家。屋里方方正正，干干净净，除了简易的书桌、书架和小凳子，没有沙发等其他家具，吃饭的时候再放置折叠餐桌。视觉上流畅得像一块大草原，四个维度全是书。

采访时间是2022年8月中旬的一天，整个城市处于一种罕见的酷热高温中。在这个晒透的顶楼“大草原”空地上，我们坐在小板凳上，听罗伟章谈关于他看的书，他写的小说，他的文学启蒙。

“此前没想到这个夏天这么热，前段时间恰好把空调卖废品了，也没再买。”罗伟章说，“沙发也卖废品了。屋里空间小，可以多给书留点位置。”有一只鸟，在屋里飞来飞去。飞翔的身影掠过，扇动空气，带来细细的风。

“这只鸟是从树上掉下来的，那时候还没怎么长毛，幸好我比猫先发现它，就把它带回来养着，等它翅膀硬了再放飞。以前这样养过两只幼鸟，都好好地飞走了。”罗伟章说。

清洗和拯救自己的办法 就是赶紧读 托尔斯泰

罗伟章写作的房间很小，放上两个不大的书柜、一台电脑桌，便没有多少转身回旋的余地。在桌前坐下来时，稍稍抬头，就能看见墙上画框中的托尔斯泰正凝视着自己。罗伟章最喜欢的作家就是托尔斯泰，“托尔斯泰写的是大文学，也就是俯身大地又高居云端的文学。”

有时候从外面回到家中，心情不快，比如不想见的人去见了，不想参加的饭局去参加了，说了自己都不喜欢的话，罗伟章会觉得“自己正在矮化”。他常用清洗和拯救自己的办法，就是赶紧读托尔斯泰。托尔斯泰的几大巨著，随便捧起一本，在阅读的过程中，他感觉托尔斯泰正将自己托起，一点点举高，高到“我又是罗伟章了”，就可以放下书，去干该干的事情。

罗伟章这样总结托尔斯泰给自己的最大启发：“当个一流的作家，并不构成托尔斯泰的最高目标。他的目标是探讨人，探讨人怎样变得更完整，更符合人的定义。事实上，如果仅仅把做一流作家当成最高目标，往往抵达不了一流的境界。做人是在作文之前，人品决定了文品，人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往往觉得这句话很虚妄，活到一定岁数，才知道它的真理性。”

托尔斯泰的作品中，罗伟章最喜欢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“不知道看了多少遍，太好了，好到‘稍不留心就可能把它的好错过’。比如安娜与伏伦斯基私奔，生了个女儿，这个女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。要是普通作家去写，安娜一定是爱她的，比爱她跟丈夫卡列宁生的儿子还爱。可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，他是如此了解人性的深厚和宽广——安娜从女儿身上，看见了自己的罪恶，她即使想爱，也不能爱，也爱不起来。”

安娜有罪，但并不堕落，因此她不会去爱自己的罪恶。这就预示了她未来的命运。有罪而不堕落，就必然承受道德负担，安娜深感自己承受不起，也试着堕落，结果她根本做不到。她后来走上绝路，通常认为是伏伦斯基顺利地回归了社会生活，对她的爱减少了，而她想回归，却不被接纳，便绝望了。其实，她绝望的核心根本不是来自别人的审判，而是自我审判。

罗伟章多年来一直琢磨一件事：托尔斯泰写一个人，一写就是几十页，然后丢下这个人，去写别的人，可当他把前一个捡起来时，你觉得那个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这是为什么？“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太明白。我也曾向批评家们请教，包括看各



罗伟章在日常写作的书房里。

国评论家的阐释，但至今没人给我一个让我信服的答案。”罗伟章说。

出门遇到知音，总是让人喜悦。有次罗伟章参加一个笔会，车上跟《十月》的宗永平同座。两人不知怎么说到托尔斯泰，十分投机地说了一路，见第一面就成了朋友。此外他还知道，徐则臣、周晓枫等也都非常喜欢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

除了托尔斯泰，罗伟章还特别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雨果，《罪与罚》和《悲惨世界》他都读过好几遍。看来他对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更崇敬，“因为他们深具力量”。

7年前，罗伟章在北京和著名批评家李陀开始深聊，之后两人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。2016年3月25日，罗伟章在给李陀的回信中说：“您提出十九世纪文学高于二十世纪文学，我特别赞同。文学成就是结果，其背后展现的思想方法和文学观念，确实值得探讨。托尔斯泰他们的写作，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作家的写作难度，面对一堵墙，他们不是装着看不见那堵墙，也不是聪明地绕过去，而是把墙推倒，让这面 and 那面打通，让光明扑面而来。所以托尔斯泰和那个时代的大师，笔下总带着原野的气息、辽阔的气息、与生活血脉相通的气息。二十世纪的作家，感觉到这种难，便另辟蹊径。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确实为文学开辟了更多的可能性。然而，十九世纪的文学是树干，二十世纪的文学是枝叶……不过，枝叶喧嚣，树干沉默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
侦察社会探究人生重塑灵魂 他们从事的 是有使命感的文学

在罗伟章的书架上，鲁迅的书有多种版本，《鲁迅全集》就有两套。他说：“鲁迅像是突然出现，一出手就是顶级的，不仅在中国是顶级的，他是直接与那个时代的世界文学接轨。他的思维能力、文学技艺，成就了个人的伟大，也成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光荣，并延续到当代。如果没有鲁迅，谈论现代文学的时

候，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底气。像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雨果、鲁迅这样的作家，文学不是文学自身，更不是文学圈子，而是侦察社会、探究人生、重塑灵魂。他们所从事的，是有使命感的文学。”

罗伟章认为，作家们喜欢谈论一个词：人性。而作家们却又往往陷入人性的泥淖。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出现之后，人性才真正焕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这首先体现在作家自己身上，然后才会出现在文字里。“我们现在的情况是，可能有态度，却没有精神。精神是生在骨子里的，是一个人的支撑。一个作家，当然也包括批评家，如果没有文学精神，就很难谈到价值。”罗伟章说。

在阅读中建设自身 找到自己的 “酵母书”

说到阅读，罗伟章提到一个深刻的体会，“为了开拓视野，肯定得多读。但多读，不是乱读。‘泛’的特征是多，这与人们贪多的心理刚好契合，因而特别容易沉迷其中。我经常说，我们有能力一个月读十本二十本书，却没有能力把一本书读十遍二十遍。贪多型阅读，是读进胃里，把一本书读十遍，是读进脑子里。所以纳博科夫才说，重读才叫阅读。”

我们谈论作家的時候，会说“伟大的作家”。罗伟章认为，谈论读者也有同样的短语：“‘伟大的读者’试金石当然首先是能否识别作品的好，其次，就是能否在阅读中建设自身。后一点非常重要，我觉得，一个读者一生中如果是幸运的，也是有意识和能力的，就会发现几本终生读物，它们不仅帮你培养判断能力，奠定阅读的标准，还像酵母一样，使你的生命发散，变得宽阔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博览群书，你的阅读就有了方向。”

作为一个小说家，罗伟章还发现，阅读和写作有高度的同一性。写作者有个天然的身份就是读者。不是好的读者，很难想象会是一个好的写作者。反过来说，一个卓越的读者，必定具有一种能力：创新性阅读。阅读的创新就是从阅读中

发现，从阅读中联想，从阅读中审视。不仅审视社会、审视生活、审视别人，同时也审视自身。这是阅读的最高境界。“学而不思则罔”，思什么？就思社会、思生活、思别人、思自身，尤其是思自身。比如我们读历史，遇到一件事，如果是我自己，我会怎么做，再看看别人怎么做，然后想一想，别人的做法高明在哪里，局限在哪里，难度在哪里。这么一想，我们就把自己置于时间的长河里，就成长了，也壮大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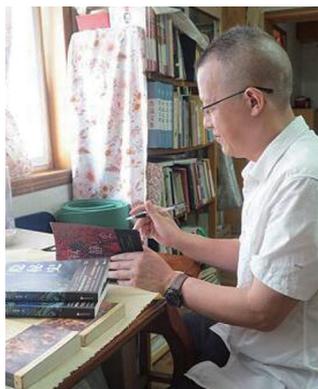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常常在写一本书的同时，也在读一本书。写的和读的，如果气场吻合，就相当于读和写都行于水上，而且顺风顺水，彼此为帆，那感觉太幸福了。”罗伟章感慨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说，阅读就是为了写作，“我们看一本书，并不一定是学习其中的技法，更重要的是仰望更高的尺度。当然作为写作者，学习技法也很重要。有些作家，比如马尔克斯，他的作品是可以模仿的，但是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，就模仿不来。还有就是莎士比亚，他的戏剧我通读过，但并没学到什么。也可能是，太好的作品，你确实不容易看出其中的奥妙，看到了也学不来，面对文本，眼前只是浩瀚的海水。就像月亮，伸手确实摸不着。摸不着也没关系，能服气地欣赏，本身就是美。如果一个人，都拿不出一些时间读一读托尔斯泰，不能跟这种级别的心灵对话，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遗憾。”

罗伟章身上有一种断舍离的清洁精神。他不是刻意苦行，更不是反物质，只是想要生活得简单一些，少一些身外之物，是一种把心灵生活过得比现实更有实在感的存在状态。他并不以此作为标榜，甚至都没怎么觉察到自己这份独特。更妙的是，他的爱人跟他是一样的人：朴素，低调，自然大方。有一次他出差回到家，看到家里新增一大堆新书。爱人说是她买的，一问花了3万块。过几天，又买了2万块的书，罗伟章说：“好了好了，虽然支持你买书，但暂时先打住，这些看完了再买。”

写作之余，罗伟章会练书法，他自己说不是练，是“胡写”，主要是放松脑筋。写得满意些的，就挂在墙壁上，所以屋里墙壁上多处挂着他的墨宝。他的儿子已经硕士毕业，学电影，如今在北京，也是一位专职写作者，写剧本多一些。儿子的房间门外，贴的全是炫酷的电影海报。电影海报与书法作品倒也相映成趣。这个家庭的成员，集体在过一种飘在云端，同时又接地气的精神生活。我想这也许是他们家酷暑中有凉意的原因吧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吴德玉 摄影报道



罗伟章在客厅书桌前。